

应如何坚持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

丁 冰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申了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一个崭新的方针，是对我国建国几十年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也是对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周期论的否定。我相信，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必将使我国经济建设跨入一个更加健康发展的新阶段。但真要使这个方针贯彻落实，却非易事，它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首先是要坚持物价稳定，反对“通货膨胀有益论”；坚持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反对“赤字无害论”；坚持社会供求总量平衡，反对“失衡常态论”；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坚持对外开放和国际收支平衡，反对片面依赖外援等。除此而外，我认为，围绕实现社会供求总量平衡这个核心问题，还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一、合理安排积累、消费比例与基建规模，反对急于求成。

社会总需求是由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构成的。投资与消费支出的资金分别来源于国民收入分配的积累与消费的基金，因此，控制社会总需求就是要使投资与消费的支出不得超过积累与消费的数额，同时也要使积累与消费有比较合理的比例，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控制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平衡的目的，而且会引起经济波动，阻碍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积累与消费

比例如何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二者比例不能人为地任意制定，它首先要受制于上年生产出来的实物产品的条件，即要看社会总产品中可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价值与可用于消费的消费资料价值之间的比例如何。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时指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①这个再生产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确定消费积累的比例，必须要有利于生产、生活。由于有些产品既可用于生产，又可用于生活，因此，在一定限度内，积累与消费比例是可以作适当调整的，调整的原则就是要生产、生活兼顾。陈云同志曾精辟地指出，在国民收入为已定的条件下，当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时，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②即首先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使之至少不低于上年的生活水平，同时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必须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不能采取吃光、分光、竭泽而渔的政策。

最后，不同时期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确定积累、消费比例也有一定影响。如为备战需要，用于积累部分就要适当多一些。

总之，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要取决于种种客观条件，如果比例不当，不论是积

累过多，还是消费过多，都将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体的合理界限在哪里，这需视各国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社会发展，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有下降趋势。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无产者队伍有愈益扩大趋势，从而无产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大，而且劳动熟练的程度愈来愈高，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增大，因此尽管无产者有愈益相对贫困化的趋势，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却可能上升，相应地财产收入所占比重却可能下降。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对西方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验的分析认为，国民收入中财产收入的比例19世纪中期为20%到40%之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开始先后陆续下降，到五、六十年代已降至约20%，甚至更低。^⑤考虑到财产收入中有一部分要用于消费，劳动收入中也有一部分要用于储蓄。因此，若按古典经济学派的假定，上述财产收入的比重即可视为积累的比重，即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积累占国民收入比重大体上由上世纪中期的20%~40%降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约20%。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一般需要有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消费；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而且正因为要满足人民日益不断增长的需要，从长远着想，就要有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积累。因此，总的来看，我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都需要使积累比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即要大于20%的积累率。从我国建国后几十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得到比较协调、稳定而迅速发展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时期年均积累率为24.2%，各年也相差不大。因此，从中外情况来看，我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大体维持在1:3的线上，或

积累率为25%左右为宜。如果低于这个界限就将造成经济停滞或衰退，如果高于这个界限，又将引起需求膨胀，比例失调，经济秩序混乱，甚至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

确定了合理的积累率，就可进一步确定合理的投资率与基建规模。一般讲，投资率（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以略低于积累率为宜。过高了会造成超额分配，需求膨胀。当然过低了会形成物资积压和大量浪费，对生产也是不利的。基建规模则须以所确定的投资规模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基建物资为限，不得任意突破，否则就留下物资、资金缺口或者形成“胡子工程”，延长工期。

确定了积累和投资率就可大体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依据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多玛的经济增长模型，如果不考虑物资设备、人力资源和技术进步等等客观条件，在资本系数为已定的情况下，适度的均衡增长率与积累率或投资率成正比。设 G_w 、 S 、 C_r 分别代表适度的均衡增长率、积累率、资本系数，则 $G_w = \frac{S}{C_r}$ 。有人估计，目前我国平均

资本系数大约为3.7，因此，如果每年积累率为25%左右的话，适度的年经济增长率就应约为6.76%。由此看出，党中央和国务院把我国今后1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定为6%左右，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也还是比较合适的。

据经济学者测算，我国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7%，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其他主要国民经济指标的相应增长速度应为：社会总产值增长率8—9%，国民收入增长率6—7%，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5—6%，总人口年增长率1.2%。

这里需要着重分析一下投资对增加社会需求的重要作用。一般说，它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增加投资需求本身。由于投资是用于基建的，其中有约40%将转化为消费需求，而且由于投资乘数的作用，还要间接引起对一系

列投资品、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直接投资额的增加而增加起来。因此，控制总需求膨胀的关键在于控制投资需求。建国以来几次经济波动的历史事实也说明，每次经济波动都与投资增长的波动有关，一般是投资增长率高的年份，经济增长率也高，投资增长率低的年份，经济增长率也低，甚至是负增长。^④所以，为了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需严格控制投资和基建规模，使之相对稳定增长，否则经济就难免要大起大落。

为了使投资增长率得到相对稳定，最重要的是要牢固树立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思想，反对急于求成，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和不顾整体利益，只从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考虑出发，乱上项目，乱铺摊子。这种只凭主观愿望而超越客观的可能和违反客观规律的行径，必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二、坚持勤俭建国方针，反对高消费政策。

为了控制总需求，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早在1957年就告诫我们：“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⑤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和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代会第四次会上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就是说，今后十年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时期都必须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要千方百计地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努力克服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领域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才能把已确定的有限的投资与费消的支出都用在刀刃上，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避免或减轻总需求膨胀。

1984年以后，曾流行一观观点，认为厉

行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实行鼓励消费或高消费政策，并认为这是在新时期的一个“新概念”。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概念”，而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从凯恩斯的消费倾向论和有效需求不足论引伸出来的政策主张。他们的所谓高消费政策，并不是简单指消费的绝对水平很高，而主要是指人为的各种办法去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促其生活消费增长。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政府和社会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提倡和鼓励人们有钱就花；第二、大力提倡奢侈华丽和追求时髦的生活，促使人们不断地向更高的消费水平挺进。从理论上讲，这实际是颠倒了生产决定消费的关系；从实际情况讲，这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这种政策对缓和其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矛盾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面对我国正处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基本情况不是过剩，而是有所不足的国情，如果硬把凯恩斯主义的高消费政策引进来，无疑只能起到南其辕而北其辙的相反作用。这是前几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实践已证明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消费的思想余毒至今并未肃清，甚至在市场“疲弱”的新形势下又有所滋长。

最后还必须明确一点，我们在这里反对高消费，旨在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奢侈、浪费，特别要反对任意挥霍公款的腐朽之风，而不是要去限制个人消费。人民群众的个人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而逐步有所改善是完全正当的，在这方面给予适当指导，使在全社会树立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良好风尚还是必要的。

三、建立合理的产品、产业结构，坚持各部门协调发展，反对“长线平衡”原则。

总量平衡是以产品、产业结构平衡为基础的，因此坚持总量平衡，必须建立协调合理的产品、产业结构，要把总量平衡与结构平

衡紧密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要使社会经济得到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使两部类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的各部门之间在价值量上相等，在实物形态上相互协调。否则就不能经过流通使产品在物质上得到替换，在价值上得到补偿，从而也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年的生产。

根据马克思两部类生产划分的理论，在我国的建设实践中具体化为以农、轻、重为序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即要以农业为基础，首先安排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增长速度，轻、重工业生产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则主要以农业所能提供的粮食、原料和市场的容量而定。相互必须保持适当比例。但过比例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是有所不同的，一般讲，工业化程度愈高，意味着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愈大，因而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愈大，所以工业对农业发展速度的比例愈小。根据西方一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的经验，工农业增长速度比例，在工业化初期为3：1，中期为2—2.5：1，后期为1.5—2：1。我国目前大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因此应保持在2—2.5：1为宜。但过去是长期不协调的，工业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农业的增长，如1952~198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53.3倍。年均增长11.7%而农业总产值仅增2.8倍。年均增长3.8%，即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3：1，其中，1985~1988年的比例更为悬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为农业4倍、5倍以上。在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很不协调，突出表现在基础工业薄弱，而加工工业却过快发展。这种产业结构失调，乃是造成供求总量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

据有的经济学者测算，我国目前各部门之间要保持合理比例的各自增长速度应是：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3~4%，粮食总产量年增长率2~3%，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10~12%，轻工业年增长率10~11%，重工业年增长率11~13%，能源生产总量年增长

率4~5%，运输业产值年增长率12~13%。^④

这里应当强调指出，产业结构平衡和合理化是总量平衡的基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总量平衡是从短期出发，侧重于需求方面的调节，那么，产业结构的平衡则是以需求结构的长期变动为依据，为保证经济长期均衡增长而致力于供给方面的调整的。因此，产业结构的平衡与合理化比起总量平衡来说，更具有重要性。

为了建立合理的产品、产业结构，首先要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方针，反对盲目蛮干的行为。这在我国是有过沉痛教训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反党集团就曾这样蛮干。在“文革”时期的计划安排中，他们不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建规模。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其次，要反对按“长线平衡”，坚持“短线平衡”的原则。要使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转变为平衡，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以短线产品为基准进行平衡，就是按当年能够生产的东 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另一种是以长线产品为基准进行平衡，即要短线产品不断提高产品指标和定额，使之向长线产品看齐。这两种观点在“大跃进”时期争论很激烈，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长线平衡”的观点占居主流，由于这种观点忽视了客观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导致比例严重失调。这也是促使“大跃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短线平衡，实际就是要把计划定在留有余地的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不留缺口。这看起来放慢了速度，实际因坚持了按比例发展的原则，速度更快，1962年—1965年抛弃了长线平衡，坚持短线平衡，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发展的事实就是证明。因此，今后我国在搞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也必须坚持短线平衡，反对长线平衡的原则，否则就不能真正建立起协调合理的产品产业

结构,使经济获得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四、选准主导产业,积极推动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所谓产业结构的协调合理,不仅限于解决产业结构失衡状态使之没有“瓶颈”部门为目标,同时还须进一步着眼于新资源的开发利用,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这是使经济获得更好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过程,并具体表现为主导产业部门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更迭过程。根据产业结构分析理论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现代产业主导部门的更迭顺序是有一定之规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主导部门的更迭顺序与随着人们收入增长而来的欲望追求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是由生产食、衣、住、用的产业部门相继成为主导部门的。如西欧的一些国家的主导产业部门依次为食品、纺织工业、钢铁、机电、石油化工和电力工业,汽车工业、服务业和城郊建筑。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所提出的优先投资的产业部门理论实际也提出了主导产业部门问题,并认为要以“联系效应”的大小作为选择优先投资部门的重要条件。所谓“联系效应”,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各产业部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产业部门之间的这种关系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他还认为一个产业联系效应的大小可用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测量。因而一个国家应以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最大的产业部门作为优先投资发展的对象,使之在各产业部门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我认为,他们的这些理论分析未必都正确,而且是以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来进行分析的,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他们都承认在现代产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有其各自相应的主导产业部门,同时也描述了主导产业部门在实

际上是随着技术进步的推进由低到高的更迭进程,表明产业结构是在不断趋向高级化的。

我国是个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主要是依靠计划安排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调节,主导产业部门的更迭顺序虽然也遵循一般由低到高的规律,但毕竟与西方不尽相同,主要区别在于不是从轻工业开始,而是从重工业开始。我国建国以来,主导产业的变动大体经历了50~60年代的钢铁,70年代的机械,80年代的耐用家电产品发展的三个阶段。目前已进入90年代,主导产业的选择对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既要与我国目前生产技术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也要符合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加速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同时也要考虑联系效应的大小。只有选择那种在目前生产技术发展水平上联系效应较大的产业为主导产业,才能通过它的优先发展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

据此,我认为,当前把电子工业作为主导产业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国经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努力已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比较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创造出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等等尖端产品和相当规模的电子工业,并在正负电子对撞机研制、超导材料的理论研究等高科技领域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但在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还处于先进技术与传统落后技术并存的二元技术结构的状态。据统计,我国在使用50~60年代陈旧技术的工业企业中,三中全会以来,已全面进行过技术改造的不过20%,有的企业甚至迄今还在使用1914年和日伪时期的陈旧设备。因此,我国现正面临着繁重的技术改造任务,大量的企业都急需先进的电子工业产品去武装。

所谓电子工业,实际是信息工业,而非一般加工工业和基础工业,它除了硬件生产,还有作为知识形态的软件生产。电子信息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它的广

泛应用标志着一次极其深刻的产业革命已经来临。实践证明,电子信息技术对各个部门都有十分强烈的渗透作用。据了解,电子计算机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作用非常突出。计算机辅助设计推动了几乎一切领域的设计革命,可降低土木工程设计成本15—30%;产品从设计到投产的时间,可缩短30~60%;废品率可降低30~90%;设备利用率可提高2—3倍。可见,电子工业在我国目前各产业部门中不仅已有相当基础。而且是“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都很强的部门,它的发展必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因

此,它已成为我国目前最合适的主导产业的选择对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7—438页。

②《陈云文集》(1965—1985年),第276页。

③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186页。

④参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表3—5,表3—7。

⑤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⑥赵涛、胡鞍钢、姚曾超:《谈谈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人民日报》1990年1月18日。

(责任编辑 徐云鹏)

企业面向市场与降低产品成本 王虎峰 朱柏清

今年改革的重点是转换经营机制,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面向市场的经济实体。使企业面向市场既是改革的目标,又是改革的必要手段。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承认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相对独立性和各企业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①任何商品生产都依赖于市场。市场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纽带,是价值规律实现其作用的经济过程。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双重目的的实现,离不开市场。企业在市场中的表现,反映出该企业的活力,企业的命运和市场是紧密相连的。

企业在市场上展开多方面的竞争。其中市场价格的竞争是部门内竞争的主要形式。产品成本是价格形成的基础,是企业竞争胜败的关键。降低成本还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社会可以用现有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有利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同时还是跻身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

现在强调企业面向市场,原因有二:首先是解决认识上存在的偏差,克服不重视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忽视“看不见的手”对经济活动调节作用的倾向,充分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次是为纠正经济活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由于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出现了企业单位不计成本,埋头生产、不问市场的现象,产供销相脱节,产品耗费高,经济效益差,突出表现是:(一)工艺落后,设备老化,技术陈旧导致物料消耗高,劳动效率低;(二)产品结构存在的问题,盲目投入,重复建设,以致开工不足或库存积压;(三)物质管理方面漏洞,物耗占成本的比例较大;(四)活劳动耗费多,主要是人浮于事和“铁工资”。企业要面向市场降低成本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依赖政府的作法。将眼睛盯住市场,按照市场需求,改革挖潜,打破“三铁”,把产品成本降到最低水平。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79页。

(责任编辑 徐云鹏)